



主编 吴敬琏 江平 执行主编 梁治平

洪范评论

本辑主题
发展与创新

吴敬琏 秦晖 姚洋

左右之间：关于社会转型路径的思考

顾淑林 等

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

Bengt-Åke Lundval

高等教育、创新与经济发展

周汉华

《国家高新区条例（专家建议稿）》说明

刘本（Benjamin van Rooij）

发展背景下的污染监管：

中国的立法、守法、执法状况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

国鲁来

农民集体土地的产权制度分析

张玉林

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

Joel R. Paul

国际贸易机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贡献吗？

徐 贲

公共传媒、创伤记忆和公民运动

D90-53/63

:9

2007

第9辑



洪范评论

主编 吴敬琏 江平 执行主编 梁治平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罗洁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洪范评论：发展与创新/吴敬琏，江平主编.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11

ISBN 978 - 7 - 5093 - 0200 - 2

I. 洪… II. ①吴…②江… III. 法律 - 经济学 - 文集
IV. D90 - 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352 号

洪范评论

HONGFAN PINGLUN

主编/吴敬琏 江平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80 × 960 毫米 16

版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张/20 字数/249 千

2007 年 12 月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0200 - 2

定价：40.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http://www.zgfzs.com>

市场营销部电话：66033393

传真：66031119

编辑部电话：66022958

邮购部电话：66033288

| 编者弁言 |

中国 1980 年代以来的改革，被认为（也常常被誉为）是渐进式的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比较诸如“休克疗法”一类社会变革模式，社会震荡小，改革阻力也小，更具有经验理性特征，“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试错方式探索改革路径。不过，渐进式改革运用不当，也可能延迟改革进程，错失改革时机，甚至为既得利益者所用，结果则是制度脱节，问题累积，矛盾激化，社会陷于分裂。渐进式改革之利固然显见，其弊也并非不见端倪。近年来，政经改革不能协调共进，既得利益集团坐大之势日见明显，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关于改革方向甚而改革正当性的论争也甚嚣尘上。值此之际，对于改革方向和路径的认真思考尤显必要。

最近，本刊主编吴敬琏教授在诸多场合向大家推荐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认为书中所论西班牙内战及后来的民主化过程，再现了现代国家建设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段深刻经验，值得当下中国知识界省思再三。为此，本刊特别约请吴敬琏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北京大学教授姚洋，以笔谈形式就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以期引起知识界对此问题的更多关注。

在吴教授看来，造成上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及其专制主义恶果的极端主义，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大敌。无论左

派、右派，一旦受到极端主义支配，就只能带来专制统治和对基本人权的漠视和践踏。要成就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依靠理性，通过对话、协商和妥协，寻求和解，建立共识。在此过程中，中产阶级扮演重要角色。关于极端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以及中产阶级在当今中国的境遇等问题，吴教授在不同场合屡屡言及，不胜忧虑。这固然是吴教授向所关注的问题，而近年来局势的演变，显然令此种忧虑更形严重。关于这一点，本刊2004年创刊号刊出的吴教授的评论文章“超越‘左’与‘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可资参照。

秦晖进一步指出，西班牙式的悲剧并非孤立个案，无论欧洲、南美、亚洲还是非洲，社会转型之际，国家都可能陷入在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左右摇摆、动荡不已的局面。而在他看来，这一时期民粹主义的问题尤为严重。为此，他辨析了民粹主义与平民立场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它们在“群己权界”问题上的根本不同，并讨论了避免陷入上述困局的可能和条件。

与前两位论者不同，姚洋更多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某些迟滞、游移、反复乃至动荡的难以避免，以及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心理根源。这样一种视角同样有助于人们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发展路向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为前导，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新”这一概念出现频率日增，甚而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然而，究竟什么是创新，创新的意义何在，如何实现创新，其条件为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数月前，我们约请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的顾淑林教授就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题作专题报告，并请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官员就此展开讨论。本辑主题“发展与创新”的第一篇文字就记录了那次报告和讨论的主要内容。

顾教授由“全球价值链”和不完全竞争的全球市场理论开始，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越出口越贫穷的“悲惨式增

长”，而要避免落入这样的陷阱，就必须走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她接着分析了创新的不同类型，并通过引述一些出现于改革过程中的实例，讨论了自主创新的机会和条件，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既有条件下自主创新的可能性。最后她讨论了创新系统中的产学研关系，指出要帮助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目标，必须有良好的创新系统和适当的创新政策，而这将涉及社会制度、组织与个人行为的诸多方面。报告中涉及的问题，在讨论中有进一步的展开。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涉及创新问题的不同方面。第一篇文章集中于高等教育与学习、创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作者系欧人，文中经验材料也主要取自欧洲国家，但其着重点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欠发达国家”。作者提出了有别于“知识经济”的“学习经济”概念，强调当前最重要的变化趋势不是在经济活动中使用更多的知识，而是知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老化。学习经济对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也因此要求高等教育（包括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改革，使之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进一步说，高等教育应该成为整个社会创新机制的一部分，并与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紧密联系。由此反观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及其与市场、企业、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人们应能获得一种新的认识。

建立创新机制，制度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建立有益于创新的制度环境本身也面对创新挑战。周汉华博士撰写的关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条例专家建议稿若干问题的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个案。国家高新区自上世纪 80 年代建立至今，业已面临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适时制订相关的法律规范，就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制度环境，通过政府体制改革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文章指出了相关立法不足的现状，介绍了该条例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特点，并分八个方面说明了条例想解决的主要问题。作者清楚地意识到，条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的尝试，这使得该文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和开放性。

立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法治事业中，立法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如欲实现立法的目的，还须有守法的激励和执法的效力相配合。刘本博士以云南滇池污染治理为案例，对中国现阶段立法、守法、执法的情形以及造成此种情形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考察。该文有实证基础，有理论观照，有比较视野，有社会科学方法，其分析与结论读来饶有趣味。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都与农村问题有关。国鲁来的文章由产权制度入手，对农民集体土地问题加以讨论，其中既有法学视角，又有经济学的分析。张玉林的文章由统计数字和三个“群体性事件”开始，分析了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在作者看来，这种动力机制最核心的问题是他所谓的“政经一体化”，即在追求发展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的地方政府同企业之间牢固的政商同盟。这两篇文章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不同，分析方法和风格更具差异，但若仔细寻绎，认真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非不相关联。

加入 WTO 是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不过，从更技术化的层面上讲，国际贸易机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并非不争的事实。Paul 的文章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的基本看法是，包括 WTO 在内的国际贸易机构与经济效率具有内在矛盾，它们可能损害经济效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负增长。而且，就国际贸易机构确曾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言，它们也往往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差距。作者的这一看法与前面顾淑林教授所说“悲惨式增长”的说法相呼应。不过，作者并未一般地反对国际贸易机构，更不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他认为，尽管其促进经济的功能十分可疑，但在通过争端解决持续减少冲突、加强合作、协调贸易政策和促进各国国内稳定方面，WTO 一类国际贸易机构的功用是显著的和不可替代的。

本辑评论文章讲述了二十世纪犹太民族的创伤记忆，尤其是这段记忆被构建过程中公共传媒的作用，以及它与公民运动的关

系。尽管这个故事发生在另一个民族身上，这段记忆也浮现于另一个时空，我们对之不应该感到太陌生，因为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原来分享着同样的人性的弱点，面对同样的道德哲学的困境，具有同样的寻求自我认同的心理需求。其实，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面对的最大问题一直是：我们是谁？我们能够是谁？这问题与中国人的创伤记忆有着深刻联系。然而，我们经受的创伤虽然深重，我们对创伤的记忆却几近丧失。这不仅意味着背叛，而且意味着自我的迷失与丧失。

目录

编者弁言.....1

洪范评论

吴敬琏 秦 晖 姚 洋

左右之间:关于社会转型路径的思考.....1

主题研讨:发展与创新

顾淑林 等

如何建设创新型国家?.....18

Bengt-Åke Lundvall

高等教育、创新与经济发展(顾淑林译).....68

周汉华

《国家高新区条例(专家建议稿)》说明.....102

论文

刘 本(Benjamin van Rooij)

发展背景下的污染监管:

中国的立法、守法、执法状况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134

国鲁来

农民集体土地的产权制度分析.....165

张玉林

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

——从三起“群体性事件”看“政经一体化”.....192

Joel R. Paul

国际贸易机构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贡献吗?

(陈春华 武晓燕译).....220

评论

徐 贲

公共传媒、创伤记忆和公民运动.....282

左右之间：关于社会转型路径的思考

吴敬琏*

今年年初我应邀在一个博士生讲座上演讲。当我讲到顾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追问，即沿着 1789 - 1870 - 1917 的道路进行革命的国家，为何会在胜利后从理想主义转化为专制主义时，推荐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作为研究“九三年”雅各宾专政的参考。不久，一位主持讲座的朋友郑重向我推荐林达的另一本书《西班牙旅行笔记》。我急忙找来这本书，一上手，就完全被它所讲述的西班牙几个世纪寻求民富国强之路的历史所吸引住了，不能不一口气读完。的确如我的朋友所言，这本书精辟而生动的阐述，将纷繁的人类历史变迁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类进步是各种社会力量抗争之后，达到一个暂时的平稳，再走向下一个冲突。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西班牙经历了近百年的坎坷曲折。剧烈的社会冲突、民族分裂、内战、专政和杀戮，只是“在一次一次冲突之后，汲取了惨痛的教训，才告别了血腥，告别了专制，走到今天。”

林达讲述的西班牙故事对中国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无疑。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公元前 209 年各路草莽英雄怀着对秦王朝残暴统治强烈的义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然而这种革命并没有带来

*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它曾经允诺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之”，“打倒了皇帝做皇帝”，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 - 1870 - 1917 这股潮流”。当时我们许多人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8 年后的 1967 年，当顾准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 1789 - 1870 - 1917 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为什么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继顾准之后，还有不少学人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破解。

《西班牙旅行笔记》提供了新的佐证。它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林达用西班牙近代史证明，在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他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这就是西班牙从 18 世纪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多次上演过的悲剧。就拿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的这次轮回来说，正像《西班牙旅行笔记》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在 1931 年建立第二共和国的初期，虽然西班牙存在左右两派，但是两翼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最底线的基本共识。它们之间的分歧，无非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另一个主张共和

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即使这种分歧不能通过和平协商来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选民用选票来决定，谁应当上台，谁应当下台。可是，当社会矛盾被激化，左右两边的极端派拉走了几乎所有的民众，国家分裂成了完全没有基本底线认同的两半，加上国际上德意和苏联两大集团的支持和挑动，分歧只能用全面内战的武力解决，最终以极右派将军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独裁统治作为结束。

如果左边的极端派取得胜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结果。就像顾准所指出的，不论个人品质多么崇高，当1789 - 1917传统的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西班牙左派还在政权存亡未卜的内战时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斗。林达为我们讲述了曾经是英国著名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满怀革命激情的奥威尔在国际纵队的列宁营中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是左翼阵营内部以“保卫人民主权”和“肃清内奸”为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乃至人身消灭。他由此痛切地认识到极权统治以公众意志的名义恣意侵犯个人自由的极端危险性。这一经历，使他创作出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的世界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

如果说1936 - 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是一场旷世悲剧，1975年佛朗哥去世、卡洛斯国王加冕后，西班牙迅速“回归欧洲”和走向民族复兴则堪称现代奇迹。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要归因于有关各方，包括出身于佛朗哥集团的新首相苏亚雷斯，共产党的领袖、当年在内战中负责马德里秘密保安工作的卡利约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冈萨雷斯，他们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了教训，共同参与了民族和解、民主转型和西班牙复兴的进程。西班牙共产党的老领导人伊巴露丽和新领导人卡利约早在佛朗哥死前多年就开始反思，并在斯大林去世后率先提出了“民族和解”的口号。1974年接任社会党领袖的冈萨雷斯大幅度地修正了传统社会

党的纲领，放弃了完全摧毁旧体制的革命纲领。而从佛朗哥的青年运动领袖出身的政府总理苏亚雷斯，也早已认识到西班牙进行民主转型的必要。再加上开明的年轻国王卡洛斯一世以高超的政治技巧从中斡旋，占了主导地位的右派温和派和左派温和派都能够采取理性态度进行协商和博弈，为共同的利益达成妥协，使西班牙得以渡过重重风波，在佛朗哥死后短短几年，就实现了民主转型，踏上复兴的道路。

其实中国人在最近一个半世纪谋求国家富强的途程中，也有过和西班牙人相似的某些经历。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国际上，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和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讨论中，人们可以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但是应该支持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要不是谩骂、不是无中生有，一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立论都应该受到欢迎。我现在感到特别担忧的是，如果匡救时弊的措施只是停留在宣言和承诺上，而实际的改进鲜有成效，各种极端的力量就会趁势而起，动员目前显得愈来愈不耐烦的民众，导致社会的动乱。

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

旧中国社会和欧洲中世纪相同，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它的一头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另一头是少数权贵，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力量即市民的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社会里，矛盾容易激化，政治诉求也容易趋向极端。在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下，暴君的残暴统治激起农民暴动推翻旧皇朝，农民当政后又或迟或早变成新的暴君，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周期更替。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和知识阶层开始壮大。在新的社会力量的孕育下，首先发生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些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发生了建立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变革。到了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 and 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职员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这批人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他们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改善和稳定，与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一致的根本利益，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所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秦 晖*

防止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反馈震荡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主要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导致灾难。一个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一种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

西班牙的事情的确比较复杂。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那个时候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都发生逆转，变成不是左派专政就是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在中世纪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但在那个时期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的一些地方，其他的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而且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做的事情都一样。在当时的维特看来，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而极左派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而且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甸、红色高棉那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

*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最黑的弄钱方式，比如贩毒、赌场、绑票。原来緬共、红色高棉控制区，现在尽搞一些比资本主义还要黑的东西。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 1930 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在这个问题上要弄清的一点是，在转型时期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他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有很大一块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个性、个体、个人权利。实际上，他们不仅仇恨富人的个人权利，也仇恨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这个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包括工人、农

民在内，只要不符合他们当时认为正确路线的人都是要倒霉的，而且他们屠杀自己人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所以我觉得民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仇恨精英而坚持大众立场。其实他是坚持一种整体化的立场，仇视一切个人化的立场，既仇视富人个体，也仇视穷人个体。比如俄国的民粹主义就有这个特征，它是非常崇拜农民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民粹派主张压制他们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提倡“整体”，而“整体”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民粹主义不能把它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一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我觉得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尤然）。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但正是因为这